



家谱常以世系表谱的形式,展示某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的事迹。

值汪曾祺纪念馆开馆之际,闲聊几句高邮汪氏家谱。

高邮出生的汪曾祺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以描写家乡的人和事为题材的小说、散文蜚声海内外。汪先生出名后,研究汪先生家世的文章也多了起来,其中重要的参考文献为《汪氏族谱》。

高邮汪氏所在的《汪氏族谱》曾多次续谱,最近的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大概是1991年前后,有灌南来的两位60多岁的老人,由街坊领到我父亲家,说是寻访姓汪的,交谈中得知他们是为续修汪氏族谱而来,因原族谱中有《起凤公迁高邮氏系图》,故特至高邮寻访汪氏。并说这套老家谱,文革中多已被毁,灌南新安镇侥幸留下一套完整家谱,现遇太平盛世,当地汪氏商议欲修谱,成立了组织,派专人四出寻访。在各地请长者负责本地汪氏谱系材料,再集中至灌南。当时商定了谱系格式,上谱的具体材料信息等等,并请高邮汪氏着一人为修谱写序。我父亲负责收集高邮汪氏的材料,他推荐由汪曾祺代表高邮作序,并介绍了汪曾祺。其时汪曾祺已名声大振,提起京剧《沙家浜》,无人不晓。

汪曾祺撰写的序由汪丽纹、金家渝夫妇转给我父亲,其中写道“闻之祖父云:汪本姪姓,文王之后也,时代久远,未可稽考……绳其祖武,不坠家声,清白为人,永葆令誉,各尽所长,以利邦国,瞩望来者,其共勉之。高邮第八十九世裔孙 汪曾祺”。文中“时代久远,未可稽考”,征得汪曾祺同意,父亲改为“虽时代久远,仍可稽可考”。

1993年底,《汪氏族谱》一套八册到手,翻看内容,深感修谱之事,实属不易,个中艰辛,非亲历者不能知。其中不足,尤在文字。有些字先对后误,有些一直是错字,致文中意思不顺。此次续修前的叙述,多为文言,现在人读之颇为费力。这些都木已成舟,难以改动。

老谱中,对女姓不作记载,只是对其中延续的重要人物,部分注有“娶某氏”的简要记录,多少年后,这“某氏”便作了“某太孀人”。这次新谱,对1980年代所生子女(多为独生子女),无论男女,都作了记载,开了好头。

从老谱知,上一次续谱成谱时间为1925年。《续谱序一》说,“1914年,江苏灌南新安有人义务修谱,历时11年,采访八载,编辑三秋,万里飘蓬,栉风沐雨,含苦茹辛,百折不回,于1925年成书,共二十卷,印一百九十五套发于族人。”那次修谱,高邮汪氏写序人为八十七世高邮汪嘉勋(汪曾祺祖父),汪嘉勋于卷首作《汪氏族谱序》,且在分册《迁高邮世系图》中又有《高邮支谱序》,落款为“民国十三年岁次甲子四月既望迁邨第七世孙 嘉勋谨识”。两次续谱,祖孙二人先后作序,难得。

1925年续谱中,汪嘉勋所作分册《高邮支谱序》中写道:……盖自子祥公讳,起凤歿于徽之原籍,刘太孀人尽室来邨,依典业为生计,故公墓在徽,而孀人之墓在邨。清例,土著六十年准入籍,然产除原籍,以杜跨考之弊。(笔者注,本小节中括号内词:自起凤公,八十一世,字子祥,于安徽原籍去世后,其夫人刘氏(高邮籍)即领所有子女来到高邮,以典当为业,所以起凤公的墓在安徽原籍,而刘太夫人的墓在高邮。清代规定,外籍移民某地,需六十年后才能加入所迁地户籍,且要在原籍去除户籍,为的是杜绝跨地参加科考之弊。)先人百计经营所费不赀矣,今以通族计之,世己(应为巳)及十,而家仅数十,非繁衍者比。然谱系不明,殊非敬宗收族之义。适灌云诸同宗联合十余县兴此举,衰集(应为哀 pou 集,作聚集讲)成编,居邨者之幸,亦匪独邨者之幸也……

凡是读过汪曾祺的《徙》,都会知道高北溟先生是汪曾祺的老师。而高北溟先生的老师是谁,汪迷晓得的未必多。史料表明,高北溟先生先后业于王淡明、杨骥渔两位前清遗老,对其学业帮助极大。

先说王淡明。其生卒时间不明。主要靠课徒鬻文为生。民国时期高邮的《文艺周刊》表明,王淡明系王引之的曾孙。然查《高邮王氏世系图》,并未见到淡明之名。他在《文孟》上作卖文的广告,称为“鬻文旧例”,时为1922年9月。其旧例的大意是,他已不再课徒,于1917年“弃缙绅”“道出申江白云观”,成了一名道士。他说卖文的收入,三分之一用于刻过去写的文章,三分之一用于游学之需。所开润笔费用亦不菲,300字一篇文章就要30元,且每加百字再加4元,而骈体文则需翻番资费。其他的诗词曲联概有定价,多少有异。他还言明,此卖文旧例,是与王国维、曾熙农、程德全等人同订,以表明自己的身价。凡有求者,都可与上海西白云观联系。这就是一个人道之后的文人卖文为生的道白,长短计价,大概也是无可奈何。旧例结尾,他再次申明,凡“讥讽谰谤文字,恕不遵命”,一个良知未泯的文人之心,可掬可佩。

往年春节,高北溟都要到汪淡明先生处拜年,有一年却因病未出门。回邨的王淡明先生得知,便敲门而入,其时,他头梳发髻,银须冉冉,身着道服,风度翩翩,有飘飘欲仙之态。高

闲话汪氏家谱

□ 汪泰

汪氏八十一世起凤于1707年逝,其夫人刘氏率子迁邨,其后八十二、八十三世未有功名记载,自八十四世汪淋起,始有“从九品衔、国学生、诰封议朝大夫”之述,然后后世多次有“截取知县、举人、九品官、五品衔、中宪大夫”等功名、诰封记录。第八十四世汪淋生于1752年,八十一世汪起凤逝于1707年,经45年。再十数年后,汪淋成年,参加科考,得功名,这其间历经刘太夫人“尽室来邨”,祖父辈不能参与科考,时间已达六十年。如《序》中说“清例土著六十年准入籍,然产除原籍,以杜跨考之弊”。这与季红真教授《汪曾祺家世》文中“……最晚也是到了他(指曾祺)曾祖父(八十六世)一代,高邮汪家才出了有功名的人”所述有悖。

汪曾祺散文《我的家》中说,“我家的大门开在科甲巷(不知道为什么这条巷子起了这么个名字,其实这巷里除了我的曾祖父中过一名举人,我的祖父中过拔贡外,没有别的人家有过功名),……这正堂屋大概是我的曾祖父手里盖的,因为两边板壁上贴着他中秀才、中举人的报条。有年头了。……”这些话,季红真教授在《汪曾祺家世》一文中亦作过引用,并说:汪家直系后人也坚持这一说法,大概得自他们父亲的口述。

查高邮支谱,汪恒(汪曾祺与我的曾祖父,行三)为“光绪辛巳年恩贡,五品衔,曾任元和县、荆溪县(属苏州、常州府)训导”,未曾有举人之说。若有举人功名,其子汪嘉勋(曾祺祖父)作序(时为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时的那次续修,定应有补续。祖先中稍有功名者,家谱焉有不书? 汪嘉勋自己为恩贡,恩贡与拔贡不全同。涉及自身,修谱也应作补充。而汪恒同辈中的老大汪芬是有功名的,家谱说他“诰授中宪大夫,‘道衍’(清,道一级官衔)‘截取知县’(清代候补官员,但他一生并未为官),同治丁卯科举人”。“因为举人,故称所住之巷为科甲巷”(我父亲《高邮汪氏家族简述》一文。父亲1925年生人,虽小于汪曾祺,但在邨时间远长于汪曾祺,许多事情的记忆,应比较清楚)。汪曾祺《我的家》写于1991年9月19日,发表在1991年第12期《作家》上,写在这次续谱前。汪曾祺先生文与《高邮支谱》所记,窃以为应以家谱所记为准。时间久远,口口相传的信息有误,难免。

季红真教授在《汪曾祺家世》写道:汪曾祺《续谱序二》中落款是“高邮第八十九世裔孙”,可见是从汪华开始排序,不是以文王为祖。但查家谱《续谱序一》中所述大意为:鲁成公二子,因其手有汪字纹样,赐姓汪,其封地在颍川,得名为汪颍川,是为汪氏宗族得姓始祖。自颍川始祖起至汪华已四十四世。这说明排序是从始祖颍川起至汪曾祺为八十九世矣。

1925年续谱,已有汪曾祺父亲汪菊生婚姻记载:娶杨氏,继张氏,子曾祺出嗣(过继给二伯汪长生)。1993年续谱,应把1925至1993年之间的许多信息续上的,不知何故,谱中未出现汪曾祺的第二位继母任氏,也未出现张氏、任氏两位继母生的所有子女(男性早亡的不上谱、女性不上谱是惯例),但补出了已去世的汪曾祥。家谱中出现的汪曾祥,纪念馆《家世简表》中却未提及。于是,汪曾祺便少了这样一位弟弟,当事人亲属会有什么感受? 这样做,不知是否和汪曾祺家人、亲属及汪曾祺研究者商量过? 许多事情,时代因之,当坦然面对。既是研究,应还原现实,才是忠实于史。

以上,实为闲话,无有争辩之意。

高北溟的老师

□ 陈其昌

北溟见了,立马作揖跪拜,行弟子之礼。

再说杨骥渔。其乃高邮“杨八房”中的“杨二房”杨芾之子,名遵路,字由之,号骥渔。杨骥渔出身门子望族,亦系当时高邮文坛的领军人物,《文孟》由他主办,其他文友协办。有一位王其相君,吟诗颂友,诗云:“珠湖百里水迢迢,蔚起文孟泛艺潮。不愿上书干宰相,尽堪下酒话渔樵。奇闻轶事凭搜索,短句长歌歇寂寥。从此风行遍海内,主盟坛占姓名标。”

杨骥渔家富得流油,却也为卖文刊发润笔的条例。诚然,他的卖文与王淡明不可同日而语,而是写文自娱,卖文生趣。从他的润笔条例得知:他少承家学,诗文词赋卓有根柢。虽曾作吏,而文字之功,未尝一日松懈,亦交友甚多。回归乡里,依然致力于文学。因求文者日益增多,特订下润资条例。文每篇10元,诗每首4元,亦可优惠,文每篇2元,诗每首5角。值得一提的是,在推荐杨骥渔诗文的8人中,有汪曾祺的祖父汪铭甫。其时,汪杨两家已结亲,汪曾祺也有8岁了。

杨骥渔先生去世,卧病在床的高北溟得知,顿时面色苍白,两眼直瞪,悲恸不已。后来,高北溟将对恩师的爱,移至杨先生儿子幼渔,并结为文友。

王淡明、杨骥渔引领高北溟成为一代名师,这位名师又将尊师爱生的传统延伸至一代大家汪曾祺。

为纪念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最近隆重推出《百年曾祺》一书。此书由梁由之先生主编,他在后记中说:“本书近30万字,全方位展示了几代人从不同时段、层面、角度对汪老其人其书的解读分析和议论,精彩纷呈,饶有趣味。同时,也为汪曾祺研究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本文。”

《百年曾祺》将拙作《汪曾祺和京剧的恩怨怨》收入其中,这让我感到不胜荣幸。更让我高兴的是,正文仅62篇的全书中,收入高邮本地作者的作品有10篇左右,几占六分之一。想想全国有那么多写汪老的美文佳作,碍于篇幅有限,梁先生左思右想,反复斟酌,最后下狠心决定:除对林斤澜、邓友梅两位老生前的挚友做出照顾外,其他每人限选一篇;再看看书中的作者多为文坛高手,相比之下,我们高邮的作者则基本属籍籍无名者。这么一想一看,不但深感梁先生对高邮作者浓浓的厚爱之意,更体会他对我乡众多文学后来人有意提携的良苦用心。

我还注意到,入选《百年曾祺》一书的高邮地方作者的作品,基本都选自2017年4月由广陵书社出版的《高邮人写汪曾祺》一书,而此书的主编是这几年创作势头正不断向上且成绩可喜的作家王树兴,他也是高邮水土哺育成长起来的有望后生。收到《百年曾祺》样书后,我立即发微信给树兴,祝贺他编的《高邮人写汪曾祺》一书有多篇入选。他在给我的回信中说:“我写汪老的纪念文章很少,要求自己多点实际行动,多个吃汪老的不如多个爱汪老的。曾经的编辑工作培养了我应具的出版人素质,为人做嫁衣多多益善。”王树兴这番话说得很好,我读了欣慰,并为他点赞。

汪曾祺新时期复出文坛之后,随着他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影响与日俱增,他的文学理论、文学精神,已成了当代文学界学习、研究的热门学问和常议话题,这一切都让我们高邮人感到自豪,也更加自觉地把继承和学习汪曾祺,做为推动与发展高邮地方文化事业的强大动力。自古以来,高邮文风一直很盛,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不是偶然。我一直认为并多次向家乡文友提出希望和建议,我们有幸与汪曾祺生在同一时代,这是上苍赐给我们的恩惠,

立夏的风吹来了。蔷薇还在,黄莺婉转,炎热尚远,是标准一段好日子。走在这样的风里,每个毛孔都舒展。

汪曾祺眼里,几乎都是好玩的事物。我在他读过两年书的地方教书。汪曾祺在这里遇见了他的初恋。

初恋的风,大约应该就是立夏的风的味道:微甜,不齁。他有这么一段文字:“江阴有几家水果店,最大的是正街正对寿山公园的一家,水果多,个大,饱满,新鲜。一进门,扑鼻而来的是浓浓的水果香。最突出的是香蕉的甜香。这香味不是时有时无,时浓时淡,一阵一阵的,而是从早到晚都是这么香,一种长在的、永恒的香。香透肺腑,令人欲醉。我后来到过很多地方,走进过很多水果店,都没有这家水果店的浓厚的果香。这家水果店的香味使我常常想起,永远不忘。那年我正在恋爱,初恋。”原来香蕉的香,是甜香。原来时间可以把世事点化得那么隽永,说自己就像在说故事。

“寿山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了,对面不见最大的水果店。不过,公园里,很热闹,很万象。喝茶、唱戏,跳舞,俗的,雅的,应有尽有。小巷子里,四方食事,汇成了一碗人间烟火。最纯美的青春故事,有了烟火打底,多年后的回忆,浓收淡抹总相宜。初恋的难忘,大约是不思量自难忘的难忘。不用刻意想起,却从来也不会忘记。

初恋,或者失恋,都不适合快意,快意恩仇的,不是生活,是江湖。而生活,在汪曾祺的字典里,“是很好玩儿的”。

汪曾祺对夏天好感颇多。比如,“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梔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

扬长避短写新篇

——从《百年曾祺》一书说开去

□ 陆建华

我们责无旁贷地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良机,以汪老为榜样,踏踏实实地把学习与宣传汪曾祺的事业切实做好。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为高邮地方文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做贡献的同时,也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并有可能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家乡,也无愧于我们自己的好作品。

现在,汪曾祺在当代文坛的影响真的是蒸蒸日上,贾平凹甚至虔诚地说“汪曾祺是个应该建庙立碑的人物”!并非我凭空随意夸大,在我看来,自汪老新时期横空出世后,我们高邮文化事业、文化人,就开始沾汪老的光,依靠汪老这块金字招牌,连连不断受益。我们所做的一切与“汪曾祺”有关的事,所写的、编的那一篇篇关于汪老的文章和一本本书,都仿佛得到特别的通行证,都陡然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王树兴主编的《高邮人写汪曾祺》获得成功,不是孤例;赵德清创办起网络品牌栏目“汪迷部落”,更是因为这是与汪曾祺密切相关。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两件事中总结出两条宝贵的经验:一,如汪老多次说“我们家乡是出人才的”,希望大家不要自卑;二,具体到宣传与学习汪曾祺一事来说,高邮的宣传文化部门、众多文化人在大力向全国文学艺术界学习的同时,也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取得同样优异的成绩,关键是从高邮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努力创新。

毋庸讳言,要学习好宣传好汪曾祺这样的文学大师,以我们一个县级市的文化基础、人力、物力,都存在明显的“短”。特别是我们的文化宣传力量一时还不能达到专家学者们的学识高度,已有的知识底蕴一时也难免应现实宣传的需要。但我们也他乡人甚至包括一些专家学者所缺少的“长”,这就是,我们与汪老同乡,我们熟悉汪老赖以成长的生活环境。我们的“长”,正是非高邮人的外乡人的“短”。所以,我们在清醒地看到“短”的同时,更要下功夫、花大气力把自己的长处用足。什么时候把扬长避短这项工作做好了,我相信,十有八九是能把事情办好的。

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话粗理不糙。每一朵花都不同,每一朵花香的方式自然有异,坚持做自己,实在很重要。

再比如,他有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记录的是在积雨的夏日,和友人在昆明莲花池边的小酒店,喝了半天慢酒的情形。小河沿岸的木香,开得正好。

立夏,离梔子和木香开花的日子就近了。

暮春的伤感,看来可以被立夏治好,包括失恋。上述昆明雨季的那场慢酒,其实也是汪曾祺摆脱失恋痛苦的法子。

汪曾祺说,“江阴是一个江边的城市,每天江里涨潮,城里的河水也随之上涨。潮退,河水又归平静。行过虹桥,看河水涨落,有一种无端的伤感。”环城北路边的护城河,我沿河走过很多次。猜测汪曾祺的“无端伤感”,可能和“初恋”有关,和“怀人”有关,和“思乡”有关。

那些有着青春哀愁的日子,故乡高邮有些远,初恋有时很近有时很远。“星期天,坐在自修室里,喝水,吃豆,读李清照、辛弃疾词,别有一番滋味。”汪曾祺在母校的两年,星期天多半是这样消磨过去的。他吃的豆,是粉盐豆。我喜欢去南街适园旁边的那家店买粉盐豆,沿着南街慢慢走,沿着寿山路慢慢走,沿着环城北路的河边慢慢走。每当节奏快了,或者我感觉闷了,就来这么一次。慢慢走路,慢慢吃豆,在汪曾祺说书一般的文字里,找到淡定的理由。

我在江阴,故乡很远,直把他乡作故乡。在一座城市停留,总有很多理由。大到牵心扯肺,小到柴米油盐。